左图：今年 7 月，改造升级后重新开放的外滩历史纪念馆，展示了上海开埠以来城市的变迁。

摄影 / 姜浩峰

携着家眷前来。”熊月之说，“同时，一些朝廷大员也纷纷将家人安置在上海的租界。比如湖南人谭延闿，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会元，在辛亥革命之际也主要在湖南参与政治活动。但他的女儿谭祥却被他安置在上海，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，逐渐甚至能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。”谭祥后来成为宋美龄的干女儿。有说法是 1931 年春，在开往上海的专列上，谭祥初识蒋介石的干将陈诚，后来嫁给陈诚为妻。

回看清末时期，因为上海成为一种中外利益共同体，而使得清廷宣布与列强开战时，牵涉到这一利益共同体的人们却都不愿意战事延烧到上海来——南方各省督抚大员不愿意，士绅不愿意，即便在上海的各国人等也不愿意。由此，在 1900 年庚变之际，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才商定《东南保护约款》和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》，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，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——亦即“东南互保”。“庚变和东南互保，令国人反思——希望国家自强不息当然不错，但一味地对外仇恨，是极其不利的！”熊月之说。

## 变革生发的生命力

在“从开埠到开放：上海都市化 180 年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，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卢汉超教授表示，就城市发展规划而言，开埠后上海曾有过影响深远的四次大辩论：华夷隔离之争，华洋杂居之争，上海城墙之争，租界地位之争。所有这些争辩讨论在当时的出发点是市政，核心是变革，结果是促成了城市的进一步开放及发展。

以租界来看，其在初期华洋隔离的时代，并没有工部局、巡捕房这样的城市管理机构。随着华洋混处以后，租界也开始发生变化。更加之此后英租界演变为公共租界，又冒出来一个法租界——上海当时的两个租界，以及华界，各种权力的控制力并不相同，城市治理方式不同，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尽相同。“这给了各种不同的力量以不同的生存空间，或者也可以称为‘缝隙落差’。”熊月之说，“各路人等在租界活动，从清末的康梁之逃亡，到章太炎、邹容在租界办报纸、杂志这样那个时代的新媒体，再到辛亥革命。其实辛亥革命是中国各次改朝换代中战事较少、流血不多的一次革命。听说要打仗了，当官的先就跑了，许多就是逃亡租界。原因在于——清末，人心早已不在清廷那里了。”

1921 年 7 月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。苏智良告诉记者：“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。1899 年，上海广学会创办的《万国公报》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。1903 年，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《近世社会主义》，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，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，称其为‘一代之伟人’，其学说为‘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’。1907 年，上海世界社《近世界六十名人》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，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用作封面。”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，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。距今 100 年前的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上海，日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向往和集聚之地。鲁迅曾说：“北京虽然是‘五四运动’的策源地，但自从支持着《新青年》和《新潮》

右图：11 月 8 日，《百年黄浦——老城厢与石库门掠影》摄影绘画展开幕，图为赵抗卫作品《石库门的记忆》。